

中原时评

■社论

更多感动,凝聚更多郑州力量

□郑重

2月10日晚8时,《感动中国2013年度颁奖盛典》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。和其他9位感动中国人物一起,被《郑州晚报》率先报道并连续报道的郑州百岁仁医胡佩兰,当选“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”。

中原大地,这片孕育过无数感动的沃土,再度迎来庄严而神圣的时刻。继续连推出洪战辉、李剑英、李灵等感动中国人物之后,作为一家时刻不忘责任担当、始终唱响社会主义主旋律的都市媒体,《郑州晚报》依托中央电视台“感动中国”这一平台,和一千多万郑州市民、一亿多河南人民、13亿中国人民一起,再谱“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”,再写“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”。

今年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,对郑州人民而言,尤其特别。郑州百岁仁医胡佩兰的当选,代表着感动中国郑州力量的加入。这样的郑州力量,稳健而从容,平凡而伟大:70岁退休后仍坚持出诊的她,坚持每周出诊6天风雨无阻;接生过的新生儿超过6万,89岁高龄仍在为患者做手术……尤其让人感动的是:多年来,老人家拿出微薄的坐诊收入和退休金凑在一起,在8年间捐建了50多个“希

望书屋”……

从颁奖盛典以及过往的系列报道中,和其他9位感动中国人物一起,胡佩兰们深深打动我们的,是他们身上的人格力量,是他们身上的人性光辉,是他们的灵魂重量。这样的感动,朴素而纯粹,浓烈而持久。以他们为主角,这些在我们身边萌发、生长、律动的真实细微到每个人都能感知的故事,丰富了我们的记忆,涤荡了我们的心灵,温润了我们的良知,给我们以慰藉与力量,更给我们以振奋与鼓舞。

眼下,郑州都市区建设正处于抢抓改革机遇,突出“三大主体”工作,实施“三年行动计划”的关键期。重温胡佩兰们的故事,在感动与致敬的同时,更多发扬“感动中国”的郑州力量,就是要呵护与追随、继承和发扬胡佩兰们身上,执着崇高、善良坚强、大爱无疆、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和时代精神,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扎实过硬的工作作风,守土有责、守土尽责、乘势而上、持续提升,为以航空港实验区为统揽的郑州都市区建设凝聚更多“郑州力量”,为实现中原崛起、河南振兴贡献更多“郑州成绩”。

■个论

清退“豪华官衙”必须纳入法律渠道

近日,媒体调查发现,一些地方在当前的“清房改革”中仍遭遇“应付式”清理。譬如一些地方为了应付上级,某地局长、副局长搬到处长办公室,处长搬到科员办公室。温州一位官员称,“清房就是要动领导的特权,领导如果不是真心改革,效果难落地。”(2月10日《京华时报》)

“官员办公楼”,被网友形象地称之为“第四公”,在“三公经费”饱受质疑之时,对“第四公”的合理性审视亦是迟早的事情。如今,各地豪华办公楼频出,有的豪华程度直逼白宫,“被清退”自在情理之中。毕竟,“办公楼”只是一个办公场所,与招商引资、身份写照等关系不大。现实中,越豪华的办公楼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也越差,不为别的,只为公帑都用来盖楼了,哪来的钱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呢?这是自然而然的逻辑。

对于清退“豪华官衙”,仔细梳理不难发现,这由来已久。据悉,我国第一个政府楼堂馆所的“限建令”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,在此后的20多年里,仅国家层面发布的政府性楼堂馆所管理文件就超过10个,而地方文件则更是不知其数了。在2013年印发的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中,更是对办公用房的管理专门设立章节,并进行了具体的细化。遗憾的是,禁令很多,但效果却很小,除却豪华官衙不断被树立起来之外,应付式清退“豪华官衙”的新闻也是屡见报端,不断地消解着“禁令”的制度善意。

如今对“豪华官衙”的突击清退,在公布的数字上,的确有可以书写的成绩,如中央国家机关86

个部门和单位清理腾退办公用房365万平方米;山西清理超标办公用房64万平方米,1.5万余个项目被停;湖南党政机关腾退多余办公室,面积87万多平方米……这样的成绩,看起来很不错。不过另一面的意思则是——这些年对“豪华官衙”的监管几乎处于“真空”地带,不然,怎么有这么多多余的办公室被清退呢?此外,这也同时说明,这些年对“豪华官衙”的禁令效果不大,不然又何须屡屡重申呢?突击执法时效果明显,就说明日常的监管与执法有虚置之嫌。

而在一次次的现实探讨中,一个共识也早已达成,而这个共识也屡屡被媒体提及。即所有国家财政拨款所涉及的部门,所有耗费公帑进行支撑和运转的组织,都应该给予国民一个明确的公示和说法。说到底,这便是信息的透明与公开,是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毕竟,只有充分的信息公开,才能杜绝一切猫腻的存在,也才会杜绝“第四公”、“第五公”……直至“第N公”浪费公帑的现象。

换言之,对于清退“豪华官衙”,必须纳入法律渠道。毕竟,最好的制度之治便是法律之治,只要我们的法律对公务员办公楼有了可以参照的标准,并明确了违反必须付出的代价,且严格执行到位,便会形成天然的震慑磁场,让官员不敢越雷池一步。果真如此的话,又何须突击执法、禁令不止呢?毕竟,回归法律的常态路径,才是遏制“第四公”乃至“第N公”的治本之策。

□龙敏飞

■个论

期待“4分钱处方”拥有更多制度土壤

看个病得花多少钱?这事不到划价时还真不知道。这两天,一篇“4分钱处方”的帖子,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讨论。一位郑州市民去河南省直三院给起红疹的孩子看病,在儿童病房,一女医生问明情况后给开了4片扑尔敏,只花了4分钱,孩子的病就好了。该名网友发帖表示感谢,帖子上附有处方和药品照片。网友们纷纷在微博上称赞:“4分钱医生”是业界良心。(见昨日本报A04版)

在一个分币几乎都不再流通的年代,4分钱的处方给人带来的无疑是巨大的现实震撼感,但开药便宜就一定与医德相关吗?在该则新闻之后,同样流传于网络上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医师宁方刚的一篇文章。宁方刚在文章中指出,作为医生,他对这位同行的医德毫无怀疑之处,但对于一个2岁的低龄儿而言,选择扑尔敏固然没有原则性错误,可会有一些副作用。尽管服用方便、价格低廉,而这4分钱的处方可能并非孩子的最佳选择,由此认定其医德高尚值得商榷。

宁方刚的观点,有待专业人士论证。但类似的“小处方”消息,却每每总能成为常

说常怒的新闻,并且报道中的主人公也被习惯性地塑造为医德高尚者。这样的惯性认知其实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。网友在议论着“4分钱处方”,实际上也在不动声色地羞辱着天价医疗。看病贵的印象早已留存为普通人的刻板印象,以药养医的医疗机构运行机制挥之不去,大处方、暴利药品的新闻又不时被爆出,如此,围观者自然就会去过度拔高“小处方”的价值,并对天价医疗愤懑不已。

那些不时显现于舆论视野,并能够轻易地挑动起民众情绪的“小处方”消息,说明的其实是两个问题。当小处方消息在连续地出现,这反证的是相关医疗制度改革的缓慢。当开“小处方”的医生一出即成为受关注人物,这反证的是现实生活中用最经济方式为患者看病的艰难。后者指向的是医疗机构扭曲的创收方式、苟同环境中单个医生“突围”不易,甚至还有患者本身的不合理要求。一些患者往往有着急功近利的求医心态,会提出不合常理的过度治疗要求,这在无形之中也助长了医生的大处方心理,进而让高价医疗成为客观现实。

从这样的角度来看,我们可以赞美“4分钱处方”

及其开出的医生,但永远别指望这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。如果健康、尊重技术、患者权益能够得以全面保障的医疗体制不能建立,那么小处方注定只是孤独的个案,是极少数医生的作为。而倘若医疗利益机制被理顺,看病费用也不会维持在一个过于低水准的层面,消费者还需为整个医疗行业的技术含量埋单,同样也不是什么病症都能够4分钱就痊愈,4分钱、几毛钱的处方终究也难以出现。所以,更关键的问题只在于:如何努力来构建起一种医生只根据患者病情开处方的机制?

长远而言,这固然有赖于医疗机制整体的转身,但即便就在当下现实中,它也并非毫无作为。譬如几年前在谈及陕西神木医改成功原因时,就有媒体报道,该县医院对所有的医生有一套严格管理其开“大处方”的制度,医生开治疗费若一天超230元,医生将被自动“停机”,且面临最高12万元的重罚——许多时候,要消弭“大处方”现象,需要的正是这种接地气的制度。在赞美“4分钱处方”时,还请对此念兹在兹。

□王聘

■街谈

“子女压岁钱最高”对公务员意味着什么?

近日,记者调查北京90名10到13岁孩子发现,父母职业为公务员的压岁钱平均水平最高,一共收到了10.41万元,平均约为5783元,高于压岁钱平均水平。与去年相比,公务员家庭的人均压岁钱上涨了4%。(2月10日《新京报》)

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,压岁钱也自然水涨船高。具体在北京这样的发达城市,孩子们过年收获高额的压岁钱并不令人惊讶。舆论之所以对此津津乐道,乃是这一张张压岁钱背后的身份对比,以及由此而透露出的行业利好信息。因为压岁钱也反映了父母们的经济状况,倘若经济形势不好,有多少人愿意打肿脸充大头?

具体对公务员而言,去年一年应该是福利大压缩的一年。在中央各项规定的持续发力下,不少公务员已于公共舆论场叫苦连天。不发年终奖、不发过年物资甚至不发年货贺卡……沿着这种趋势前进,2014年春节,公务员家庭的压岁钱平均水平,不说最高,至少也应低于其他一些社会群体。然而,现

实往往不会沿着我们的剧本亦步亦趋。新闻中,“父母职业为公务员的压岁钱平均水平最高”像是一份另类的节后问候,向我们暗示也是在向孩子们暗示,做公务员仍然挺好。

衡量一个职业的“好坏”,有时候可以透过其子女的压岁钱水平来辨析。《新京报》的这项调查发现公务员家庭人均压岁钱水平最高,其实也折射出社会行业的选择趋势。拿刚刚回到一线城市的众多白领来说,过年的压力是巨大的。尤其是压岁钱,基本是孩子收进多少,父母就包出多少。而不少公务员家庭,却没有这样的烦恼。因为他们的压岁钱,已不局限于几个亲戚。仅此一项,孰优孰劣,已当下立判。

当然,对于整个公务员群体而言,“压岁钱平均水平最高”的结论未必公允。因为并非每一个公务员家庭的子女都能收获数额丰沛的压岁钱。但从预防腐败的角度而言,这种小调查所反映的真问题却也不容小视。一方面,包压岁钱的确是人情往来需要,

公务员群体当然也不能免俗,制度规定应该照顾这样的现实。但另一方面,公务员由于其特殊的职业属性,其子女如果接受过高的压岁钱,却也会影响其公职行为,构成不当得利甚至受贿。

如何还压岁钱一份美好,还春节一份年味?这自然需要社会上对压岁钱正本清源。旨在送去新年祝福的压岁钱,不应成为人们的一项经济负担,某些大人物的游戏,它应该重新回归年味的价值,以一个孩童可以承受的零花钱尺度,真正变成属于他们的过节福利。而对公务员群体而言,如果说,子女压岁钱的数额纳入相关部门的制度监督范畴值得商榷,但不管是当前的财产公示还是预期中的财产申报问题,都应被重点关注。以此而论,“公务员家庭人均压岁钱最高”不仅是一道作风考题,考验着每一个公务员坚持禁令的决心,也是一道改革考题,考验着我们的制度监督如何更接地气,更有利于公共管理。

□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